

内部交流

研究与参考

2021年第1期（总第98期）

美国智库建言拜登政府文章汇编（一）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编者按：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任命多位智库人士担任内阁高官，外界普遍认为，美国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将得到明显提升。当前，拜登政府正在全面审查特朗普时期的各项政策，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政策路线，美国各大智库也希望利用这一政策转型时期，积极发声，建言献策，从而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我们将及时对部分美国智库建言类文章进行摘要汇编，形成系列，以助益我们对美国新政府未来政策走向的研判。

我们摘编相关文章，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支持其观点。

目 录

【支招中美关系】	1
布鲁金斯学会乔治·英格拉姆建言拜登政府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倡议	1
PIIE 杰弗里·肖特建议调整对华金融制裁政策	2
CSIS 甘思德称美国应向新的对华方针过渡	2
新美国安全中心马丁·拉塞尔称美国应使用国家技术战略应对中国挑战	4
新美国安全中心乔丹·施耐德谈美对华战略需要新的政策工具	6
传统基金会为未来十年美国如何回应中国“支招”	7
帕米尔咨询公司默茜·郭谈跨大西洋联盟如何应对中国	8
CSIS 约翰·肖斯称美国在印太地区不应过分强调中国	9
CSIS 安东尼·科德斯曼称美需改变与中俄竞争的方式	11
新美国安全中心泰勒谈美国如何应对中俄合作	12
【重塑美国角色】	14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瑞秋·克莱因菲尔德分析如何修复美国民主	14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乔恩·贝特曼谈美国如何在暴动时代维护国家安全	16
国家利益中心保罗·希尔建议拜登政府如何恢复美国在海外的地位	17
布鲁金斯报告谈美国该如何重回多边舞台	18
布鲁金斯学会英格拉姆谈美如何在变化的世界中恢复全球参与	19
【建言经济方略】	20
PIIE 查德·鲍恩谈拜登政府如何重返多边经济合作	20
CSIS 威廉·莱因施谈拜登政府将如何处理贸易问题	21
布鲁金斯杜大伟称美国“亟需”重新思考在亚洲的经济政策	22
传统基金会托丽·史密斯谈华盛顿在 2021 年的三大贸易政策优先事项	23
CSIS 建议美国建立新的全球贸易框架	24
【应对地区安全】	27
美国企业研究所肯尼斯·波拉克称美应以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战略应对伊朗	27
卡托研究所卡彭特称拜登应制定现实的对朝目标	28
布鲁金斯学会约书亚·怀特谈如何加强美印防务和安全合作	29
西华盛顿大学比蒂沙·比斯瓦谈美印安全合作的新前沿	29

【支招中美关系】

布鲁金斯学会乔治·英格拉姆 建言拜登政府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倡议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1 月 7 日登载该智库全球经济和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乔治·英格拉姆（George Ingram）等的文章称，拜登政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让中国对其“一带一路”倡议更加负责：

首先，美国应重新领导和参与多边机构，并鼓励中国采用国际标准，使“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发展原则，使受援国真正受益。通过国际论坛和志同道合的发展伙伴，强调不透明和不负责任的做法造成的危害。

其次，优先考虑一项资金更雄厚的经济发展计划。未来四年，对经济发展项目的投入至少应占所有援助项目的四分之一。为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防止各国政府受到中国对外援助的诱惑，或者至少要求“一带一路”项目展现更多责任感和透明度，提供强大的资金是必要的。

最后，认真审查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援助方面好坏参半的记录，并保留已被证明有效的政策和项目，以确保美国应对中国对外援助模式的连贯性和整体性。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IDFC），应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资助国的发展金融机构合作，提供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

PIIE 杰弗里·肖特建议调整对华金融制裁政策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肖特（Jeffrey J.Schott）近日撰文称，美国应该慎用对中国的金融制裁，因为这些制裁的连带成本会损害美国生产商、金融机构以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文章称，鉴于美国与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南海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断增加，美国官员或将加大对中国主要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金融制裁力度。但美国应该谨慎行事，避免在未对此举对美国利益和国际金融市场产生的潜在后果进行充分分析和清楚了解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金融制裁。

实施金融制裁应遵循一个更温和的过程，使用根据特定情况制定的“胡萝卜”和“大棒”。美国应与主要盟友加强合作，并适时妥协，以确保有效执行制裁政策。

美国官员应该谨记，制裁只是经济治国方略众多工具中的一种。美国官员不应冒着使金融市场断裂的风险加大金融制裁力度，而应使用其他战略性经济反制措施来打击不当的外国行为。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禁止进口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和向香港居民发放签证等政策来回应中国的行为。其他措施，如资助先进微电子技术的研发，增加战略性矿物的生产和储存等，也可以借鉴历史先例。

CSIS 甘思德称美国应向新的对华方针过渡

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四年前特朗普刚上任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管理特朗普政府遗留的对华政策遗产是拜登政府面临的主要外交挑战之一。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近日登载该中心中国商务和经济学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文章称，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四年前特朗普刚上任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管理特朗普政府遗留的对华政策遗产是拜登政府面临的主要外交挑战之一。文章摘要如下：

一些人认为，由于北京方面的强硬姿态和特朗普任期最后阶段对中国实施的一系列限制和惩罚措施，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上难以转变。但实际上，拜登政府拥有很大的对对华政策进行创新的机会。拜登政府可通过两个步骤来摆脱特朗普政府对华方针的束缚：充分评估现有措施的预期、工具和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新措施；为推进某些事项制定系统的计划，并决定哪些现有政策措施应该保留、改革或抛弃。

拜登政府不应简单地调整对华“脱钩”的程度，而应以一种新的概念来看待中美关系，并将对华政策融入其对美国和世界制定的更大计划之中。为了成功过渡到一项新的、更有效的中国战略，拜登政府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使用现有的措施。这些措施可以分为四大类，每类都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处理：

第一，单方面的多边主义。这类措施包括拜登政府应该单方面中止的行动，这些行动对美国及其盟友造成损害，却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或战略好处。取消这些措施可以开启修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增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的程序。拜登政府已经表明，其会支持而不是削弱世贸组织（WTO），重返巴黎协定，重新加入世卫组织和伊核协议。拜登政府在上台初期采取这些举措将向世人表明，当今世界最重大的挑战是中国，而非美国的盟友和他们帮助建立的国际机构。

第二，孤立中国。如果中国的行为威胁学术自由或违反规则，拜登政府就需要扩大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拜登政府应该将人权作为

优先事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相关限制措施。拜登政府可能采取的一种新方式是，不再承认香港和澳门在国际组织中的资格。

第三，双边关系的稳定。有一类政策工具拜登政府可能永远不会使用，其应该设法改变，包括：撤销 301 关税、结束双方驱逐对方记者的行为、重开休斯敦和成都的领事馆、取消对微信和抖音的威胁、恢复富布莱特和和平队在中国的项目等。取消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稳定中美关系，但这并非要求美国单方面取消这些政策，而是需要通过谈判促使中国对等或回应美国的关切。

第四，对特朗普政府的限制措施进行修改或改革。这类政策是最棘手的，拜登政府本身可能并不会采取这些政策，但这些政策符合人们对中美双边接触负面风险的广泛担忧，如高科技和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触的基本规则。拜登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国内改善特定的政策工具，并与其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盟友建立更强大的联盟。拜登政府需要对政府可用的广泛工具进行协调，整合关税、实体清单、投资审查、金融制裁和公平贸易工具，来服务更广泛的国家利益。

虽然特朗普政府想在对华政策上束缚其继任者，但拜登政府在重塑美国对华政策方面仍有很大的灵活性。系统地处理好上述遗留问题是超越修修补补和被动管理的第一步。拜登政府应该认真审视每一项政策，思考它们之间有何关系，以及保留、修改或取消这些措施如何与他们自己的新举措衔接起来。

新美国安全中心马丁·拉塞尔称 美国应使用国家技术战略应对中国挑战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该中心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马丁·拉塞尔（Martijn Rasser）等撰写的报告《掌舵：一项

应对中国挑战的国家技术战略》。

报告称，技术是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关键推动因素，也是中美竞争的前沿和中心。美国政府必须为与中国进行持续竞争制定一项国家技术战略，以保持美国现有的优势，并创造新的优势。

第一，提高美国的竞争力。美国政府需要采取全面和紧急的行动，为科技基础的长期和全面改善奠定基础。增加美国的研发投资，国会应在 2030 年之前将联邦政府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提高到至少 2%，将国家总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至少 4.5%。制定并执行一项全国人力资本战略，增加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和技能培训，壮大并维持美国的科技劳动力。吸引并留住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科技人才。

第二，保护美国关键的技术进步。维护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优势和阻止不必要的技术转让，对于制定成功的国家技术战略至关重要。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需要同时采取保护性和前瞻性措施。为了确保美国的技术优势，美国应该重新确定出口管制的目标，与伙伴国家就投资限制进行合作，阻止和减少不必要的技术转让，重组关键供应链，以确保关键供应链的多样化和安全。

第三，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使成功最大化。美国拥有出色的盟友和伙伴国家网络。美国应利用这一优势，与这些国家开展合作，以加强双边和多边研究，建立国际研发中心来促进有关基础和应用研究的国际合作；创建一个多边合作网络，以便盟国和伙伴国家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能够在参与国旅行、工作和生活；领导志同道合的国家为技术的负责任使用制定规范；更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恢复国际标准制定的诚信。

第四，为定期更新战略制定计划。技术变化的迅速和不可预测性意味着美国需要经常重新评估国家技术战略。良好的战略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并相应地调整战略的要素。美国政府需要采取

三项广泛的行动，以确保国家技术战略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仍然适用：定期审查技术目标及其基本假设；创建一个可重复和透明的程序来更新技术战略和重要技术领域特定战略的技术优先事项；建立并扩大永久性的技术分析能力，以增强美国评估技术发展和趋势的能力。

新美国安全中心乔丹·施耐德 谈美对华战略需要新的政策工具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学者乔丹·施耐德（Jordan Schneider）等的文章《美对华战略需要新工具》称，拜登应该重新思考其地缘经济工具，并与国会合作向行政当局提供更有效的方式，来应对中国“掠夺性”的经济政策。文章认为：

首先，美国应实施多层面的战略来反击中国的“胁迫”。成功有赖于强大的国内基础。拜登应该通过协调的产业政策支持先进和关键产业，重点打造下一代技术和清洁能源替代品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为了在 21 世纪获得成功，一项综合的方法将要求对政府的能力进行再投资，如建立现代化的复兴金融公司（RFC）来扩大公共投资；建立新的联邦雇用程序来吸引领军人才加入公共服务的队伍。

再次，拜登政府应与国会合作改革“232 条款”。国会应调整该条款，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对针对盟友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胁迫性贸易行为征收报复性关税。同时，加强国会对政府的监督和限制，以消除“232 条款”被滥用的危险。

最后，拜登政府应以“威廉姆斯委员会”为蓝本建立一个总统委员会，重建两党政治共识，并研究如何创造性地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宏观经济根源，包括货币干预原则，向资本流征税等。拜登还

应考虑启动一项类似北约的国防贸易协定，保护其他国家免受中国“掠夺性”贸易行为的影响，进而帮助美国及其盟友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拉近盟友间的距离。

传统基金会为未来十年美国如何回应中国“支招”

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近期发布报告称，未来十年美国面临的最持续、最重要的挑战是中国崛起。为了应对已经在全球舞台上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展示其保护自身重要利益的决心。报告为未来十年美国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描绘了“蓝图”，并提出五十多条建议。报告建议美国在印太地区采取以下措施：

战略存在方面，为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推动伙伴关系建设，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搭建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与台湾（地区）和印度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重申与西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军事存在方面，加强美国的军事存在，积极维护国际水域的使用权。

多边组织方面，明智地使用美国的资源，在选举之前仔细审查领导职位的候选人，对抗中国的金融和政治压力；敦促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基金和项目为美国公民增加就业；设立负责多边事务的副国务卿，明确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扩大影响的目的、范围和手段。

经济关系方面，纠正美中经济关系的发展轨道，谈判更多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官员重建经济对话，收集更多关于中国经济的信息；改革和支持世贸组织；制裁通过网络手段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人；充分资助和利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支持美国司法部和国防部打击中国的“恶意”活动；借关注国内改革来解决人们对战略性矿产品可用性的担忧；推动银行业改革。

此外，报告建议加强美台关系，包括：继续向台湾出售新型先进战斗机，支持台湾购买柴电潜艇，积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台湾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并开展高级别经济对话。

在落实美日印澳四边倡议方面，报告建议：扩大四方对话各方的海洋领域意识合作，建立一个印太地区海事监视结构；协调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跨部门应对，就“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战略影响和后果发布年度报告，建立“一带一路”投资数据库，促进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透明度，改进和调整现有的贷款机构，梳理“一带一路”投资之间的联系。

报告称，中国崛起是美国未来几十年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任何阻止中国崛起的举措都不会奏效。然而，中国崛起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影响是可控的。在经济方面，市场将处理中国崛起带来的许多具体问题；在外交、情报和军事方面，美国需要一个长期的方法，且两党需要作出承诺。

帕米尔咨询公司默茜·郭谈跨大西洋联盟如何应对中国

《外交家》杂志网站2月23日登载帕米尔咨询公司（Pamir Consulting）行政副总裁默茜·郭（Mercy A. Kuo）的文章，就跨大西洋联盟如何应对中国提出了四条建议。文章摘要如下：

第一，美国与欧盟应就与中国有关的贸易和技术问题展开合作。美欧应在投资审查制度方面进行协调，共享信息和最佳做法，并制定共同的出口管制规则，以防止敏感技术的转让。一种做法是更新《瓦森纳协议》的技术管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3D打印、量子计算和其他具有国家安全价值的新兴技术。

第二，北约可以也应该成为跨大西洋和与印太地区国家进行信息共享的场所。很多印太国家在制定国内对华战略时，面临类似的

与中国有关的挑战。北约应考虑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提供资源，以帮助它们避免或减少在高风险技术上对中国的依赖。北约还可以帮助其成员国和伙伴进行能力建设，以更好地同中国进行技术竞争。

第三，评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尽管该协定并不是一个“好”信号，但是其并不排除美欧就中国展开合作的可能。很多事情取决于欧洲领导人向华盛顿发送的合作信号，美欧仍然可以在很多与贸易有关的议题上展开合作。此外，该协议还需要批准，现在还不清楚欧洲议会是否会批准该协议。

第四，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言论和行动表明，美国正在重回多边主义，这对于增进与欧洲盟友的互信和协调至关重要。拜登政府的很多官员是欧洲熟识的老面孔，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经验丰富，这为双方构建信任奠定了基础。

CSIS 约翰·肖斯称美国在印太地区不应过分强调中国

与盟国和伙伴重建建设性的关系和与中国明智的接触，将是重新调整美国在亚洲政策的关键。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国际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约翰·肖斯（John Schaus）的文章，分析了美国当前在亚太地区过分强调中国的国防政策带来的影响。文章摘译如下：

拜登政府已发出信号，美国将在亚洲恢复传统的外交政策，优先考虑盟友和伙伴，并大力倡导人权和民主。此举表明美国将放弃当前近乎单一地优先考虑中国的国防政策。在拜登政府重新制定政府政策和战略之际，应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过分强调关注中国是否是正确的方法。单一关注任何一

个国家，对美国及其全球利益和全球安全承诺来说都注定不会成功。美国的安全并不仅取决于某个单一威胁，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核扩散、防止常规冲突以及促进联盟和伙伴关系都很重要。只关注一个安全利益得失会扭曲美国的战略。

第二，当主要关注中国时，美国的安全战略忽视了盟友和伙伴。美国在过去几年中将重点更多放在“超过”中国，而不是培育能够推进美国利益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上。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在亚洲，或者在全球竞争中的成功，应该以其扩大和深化联盟和伙伴关系的能力来衡量。

第三，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想要更多的美国参与，而不仅仅是在国防问题上。几乎所有盟友都欢迎美国增加在他们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印太地区国家发出的一个信息是，他们寻求避免在安全与繁荣之间做选择。但他们看到美国的政策在过去四年中聚焦安全措施，而不是为他们提供一个替代选项，使他们的繁荣不必过分依赖中国。

第四，拜登政府的亚洲政策应该强调大流行、菲律宾和“太平洋威慑计划”。首先，美国应在印太地区开展合作，建立应对疫情的共同事业，将有助于加强人民之间的联系，并使美国的长期主张——美国的利益不只是用硬实力制衡崛起的中国——更加可信。其次，拜登政府应该优先考虑与菲律宾的接触，并确定一项行动计划，关注菲律宾的利益，而不仅是硬安全。制定并实施一项有利于经济、健康和人类安全的计划，将表明美国致力于帮助东南亚志同道合的国家，并使它们能够不必在中国或美国之间做出选择。最后，国防部应利用“太平洋威慑计划”的资源开发演习，测试美国军队使用当前和未来能力实现具体目标的能力。

即使拜登政府在围绕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新重点上逐渐形成其亚洲战略，它仍将不得不对中国施压。与盟国和伙伴重建建设性的相互关系，再加上与中国明智的接触，将是重新调整美国在亚洲

政策的关键。

CSIS 安东尼·科德斯曼称美需改变与中俄竞争的方式

目前美国越发倾向于通过一种结构不合理的方式来与中俄对抗，更多聚焦于最坏情况下的战争，而不是更广泛的竞争。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该中心专家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等执笔的报告称，美国需要改变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的方式。

报告称，目前美国越发倾向于通过一种结构不合理的方式来与中俄对抗，更多聚焦于最坏情况下的战争，而不是更广泛的竞争。美国未能整合民事和军事竞争，未能解决“灰色地带”行动，未能着眼于竞争的全球性质，也未能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竞争要么不涉及直接战斗，要么只涉及低水平的战斗。美国没有适当优先考虑处理战略伙伴关系，也没有对竞争的长期模式进行综合评估。

报告强调，美国不能把重点放在与中俄的重大常规战斗或战区层面的战斗上，实际上大多数军事竞争可能发生在“灰色地带”、混合战争或非正规层面。美国必须在全球层面参与竞争，因为中俄通常会间接开展竞争，目标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这就需要美国继续在全球各地部署强大的军力，特别是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美军各司令部和主要盟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将决定美国取胜的总体模式，对威慑和防止重大冲突和核战争至关重要。

报告认为，美国需要对其竞争方式做出重大调整，不能只考虑军事竞争，也不能把战略伙伴和其他国家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若要有效地竞争，美国必须：关注中俄使用的所有民用、军事和经济

“灰色地带”战术，及其对特定战略利益的累积影响；以类似于中俄和其他国家与美国及其战略伙伴竞争的方式，采取真正的全政府手段，开展联合军事和经济评估；通过处理所有“灰色地带”军事行动来应对军事竞争，并通过利用主要作战司令部为每个国家和地区制定合适的战略；将重点放在建立和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上，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与中俄开展直接竞争的狭窄领域；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发展一个能应对所有领域竞争的综合战略。

除上述措施外，美国还必须在非机密层面上更有效地参与竞争。主要重点应当放在开源报告上，借此揭示非法或隐秘竞争，点名披露中俄官员和秘密活动，引用第三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资料，并且展示此类活动的历史记录和模式。

最后，美国需要制定计划、项目和预算，切实执行可行、成本效益高的战略，以应对中俄挑战、工业时代带来的新问题以及新冠病毒产生的持久影响。美国需要更明智地利用当前资源和盟友的最大潜力，同时充分利用民用和经济领域的国内资源。

新美国安全中心泰勒谈美国如何应对中俄合作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跨大西洋安全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安德莉亚·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等的文章称，美国应该限制中俄关系的发展，缓解两国合作对美国重要利益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的战略、言论和实践应该对中国和俄罗斯加以区分，并加大努力了解中俄合作的情况，包括两国之间的技术转让。努力预测和思考两国合作会如何影响美国利益。加强有关中俄合作的情报收集和共享，进行作战模拟和情景规划，并为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做好准备。

美国可以采取一系列行动，减少中俄之间的趋同。这种“一石二鸟”的行动是减轻中俄结盟影响的有效途径，包括：重新确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重新致力于联盟；支持民主国家提高韧性；将军控和战略稳定对话“三边化”；吸引中国和俄罗斯人才到美国。

俄罗斯和中国并非在所有问题或每个地区都立场一致。美国可以采取措施加深中俄关系的裂痕，包括：允许俄罗斯向印度和越南出售武器；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向中国宣传俄罗斯在中东和北极等中国有投资的地区破坏稳定的行为。

【重塑美国角色】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瑞秋·克莱因菲尔德 分析如何修复美国民主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1月7日登载该智库民主、冲突和治理项目高级研究员瑞秋·克莱因菲尔德（Rachel Kleinfeld）的文章称，总统拒绝让出权力、其支持者使用暴力和恐吓来向政治官员施压的行为破坏了美国的民主。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正面临严重的党派分化，但这种两极化主要与政策无关。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在堕胎、移民和枪支立法等问题上的想法类似。问题在于，美国公民越来越憎恨和害怕对方，并忠于自己的政党。这种现象被称为“情感两极化的情感部落主义”。

严重的两极化似乎预示着民主的末日。但事实上，调查发现，情感两极化在许多国家（如丹麦）更为严重，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应对疫情等方面做得更好。近年来，美国的两极分化愈发严重，但美国民主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两极化的产物。

高度两极化的政治环境孕育了第二个问题：民选的、受欢迎的党派从内部破坏民主。在高度两极化的国家，党派人士虽然也关心民主，但他们更关心自己所属的一方赢得选举。

美国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来扭转上述趋势，但多管齐下的策略可能会有所帮助。这将涉及促进新的政治结盟，加强制度和规范，并促进社会和经济层面的重新联系。

美国需要一个或多个保守党派。最近一系列激烈的选举证明，近一半的美国选民明显持有一系列值得代表的保守思想、价值观和利益。但内部改革似乎不太可能，由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小部分势力组成一个温和的中间派政党的想法似乎同样不可能。情感两极化意味着，两党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跨越界线，组建一个可行的第三党。

因此，促进新的政治结盟的最佳选择是采取某种形式的优先排序投票（ranked choice voting）。在这种投票中，选民对他们喜欢的候选人进行排序。那些得票最少的人会被淘汰，而那些给他们投票的人会看到自己的选票被投给自己所选的第二位候选人。这种投票方式可以让共和党内不同意识形态的候选人相互竞争，而又不破坏共和党赢得选举的机会。

这个选举周期揭露了一系列制度上的缺陷，包括缺乏对举报人的保护。众议院 2019 年的一项名为 H.R.1 的法案解决了其中一些问题。加强制度还要求坚持问责制。为追求权力而触犯法律的人应当受到惩罚。最后，国家和州的执法部门必须采取新一波行动，打击暴力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国内恐怖分子。

利用两极分化获得权力的政客只是在回应民众的需求。美国人对他人和政府的信任度几乎处于最低点。孤独和疏离导致人们在国家政治和网络运动中寻找归属感。虽然很多白人至上主义者都是可恨的，但一个致力于帮助人们远离极端组织的机构发现，寻求“与暴力极右组织接触的美国人点击心理健康广告的可能性要高出 115%”。现代生活的失范和异化需要人们做出创造性的、自下而上的努力，加强美国公民生活和社会纽带。

加强社会纽带也需要一个为更多人服务的经济体系。推动疫情后经济发展的政策至关重要，这些政策尤其要考虑没有大学学位的各种族男性以及大批被迫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女性。这些群体的经济复苏对于民主复苏必不可少。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乔恩·贝特曼 谈美国如何在暴动时代维护国家安全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技术和国家事务项目研究员乔恩·贝特曼（Jon Bateman）的文章《暴动时代的国家安全》称，目前美国在国内面临着比在国外更大的危险。美国必须反思保障国家安全究竟意味着什么。文章摘译如下：

美国必须承认，美国国内急需更新，这比很多国家安全挑战更急迫。中国将需要几十年时间与美国在全球达到均势，但美国的民主可能在一到两个选举周期崩溃。拜登政府的新政策将面临持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人的抵制。为了克服这些阻力，拜登需要向其政府和公众传达两个坚定的信息。

首先，国家安全机构必须更好地了解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内挑战。他们必须解决美国民主的危机，以及导致这些危机的经济、种族和文化不满。美国政府需要将更多专家部署到国内前线。其他问题也需要更多辩论，例如，即使在人权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对华政策应优先考虑经济关系。

其次，重新将国家安全机构的重点放在国内问题上，并要求国家安全机构让出一些资金、人才和注意力给那些可以直接帮助修复美国的机构。这一转变不仅涉及资金，还涉及人员。比起外交官和士兵，美国更需要教师、选举官员、公共广播电台和社会工作者。

最后，美国政府还必须更好地分配注意力。白宫的总体力量仍然相当不平衡，国家安全委员会过于冗杂，并占用了总统过多的时间和注意力。拜登需要一个新结构，以确保国内问题时刻被放在首位。

国家利益中心保罗·希尔 建议拜登政府如何恢复美国在海外的地位

《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1 月 3 日登载国家利益中心杰出研究员保罗·希尔（Paul Heer）的文章称，在美国重建自身的国际地位之前，必须先治愈自己。文章摘译如下：

恢复美国自身的团结将是恢复美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先决条件。过去十年来，美国的国际地位受到了严重侵蚀。中国的崛起，俄罗斯大国雄心的复活，发展中世界不断变化的权力动态以及东西半球经济实力的整体转变，使世界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美国必须认识到并适应这个新历史时期。

为了恢复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美国可能需要把眼光放得低一些。全球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平衡的改变可能降低了美国完全恢复其在 20 世纪后半叶享有的全球主导地位的机会。美国国内面临的经济和政治挑战会减少美国可用来追求外交政策目标的资源和注意力。

美国将需要更多考虑如何使其国际目标和财力相匹配。重新评估哪些战略利益和外交政策目标是真正至关重要的，哪些偏好是可以调整或妥协的。美国还应该对其面对的外部挑战进行精确的评估，而不是夸大这些挑战。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国内。美国必须先通过遏制新冠病毒疫情、恢复经济和弥合国内政治分裂来治愈自己。除非能使美国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成功并具有吸引力，否则美国无法在全球竞争。

布鲁金斯报告谈美国该如何重回多边舞台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期发布报告，分析了全球多边主义的变化趋势，并为美国重回多边舞台提出了六项指导原则以及具体可采取的措施。

报告称，拜登政府上任后面临一个完全改变的国际格局——特朗普忽视国际秩序、废除国际承诺的行为，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筹码和影响力；崛起的中国在塑造国际准则和制定国际机构议程方面变得更加有效和自信。因此，拜登政府必须借助多边政策工具，来推进美国的一系列优先事项。

报告提出了所谓的“费城原则”，从三个层面为美国参与多边舞台提出建议：

全球原则：多边秩序现在被大国竞争所定义，尤其是与中国的竞争；应对跨国威胁，特别是气候变化，必须成为美国多边政策的基本目标。

伙伴关系与合作原则：多边途径的运用应该从那些认同美国价值观并致力于推进民主的国家开始；成功的多边主义需要战略性地利用多种机构，包括非正式程序、俱乐部模式和非约束性承诺。

国内政治和官僚主义原则：多边优先事项必须纳入美国的总体外交战略；多边目标必须与美国人民的利益和美国寻求在国内体现的价值观相一致。

报告称，虽然上述原则的实施对美国多边主义的长期有效性至关重要，但新政府在上任初期也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重新参与多边秩序。拜登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包括继续推进重新加入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世卫组织的进程，就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但今后四年，拜登政府还必须为更重要的多边

行动奠定基础，包括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改革世贸组织以及加强全球气候治理架构。总之，遵照“费城原则”，采取重大、政治上可行的改革和重新接触措施，将确保多边政策制定能够促进美国人民的福祉和安全。

布鲁金斯学会英格拉姆 谈美如何在变化的世界中恢复全球参与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可持续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乔治·英格拉姆（George Ingram）的文章称，拜登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恢复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和参与。文章摘译如下：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以及特朗普政府在全球领导地位上的收缩，揭露并加快了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变化。这促使人们重新评估“美国例外论”。美国应该采取以下措施重建美国的全球参与和伙伴关系：

一是提高外交和发展的地位，快速提名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千年挑战公司、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领导；使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进入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职业发展和外交人员的数量和多样性。

二是恢复对国际组织的积极和合作性参与，偿还拖欠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的款项，领导解决发展中国家不断膨胀的债务危机；改革国际组织的治理，使其更适应、更能代表 21 世纪的国际秩序。

三是采取政策行动向国内民众推销自己的政策。好政策不会自动获得民众的支持，如果拜登要推行“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他就需要向公众解释该政策如何惠及美国和美国人民。

【建言经济方略】

PIIE查德·鲍恩 谈拜登政府如何重返多边经济合作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近日登载该智库贸易政策专家查德·鲍恩（Chad P. Bown）的文章称，拜登政府应该重返多边经济合作。

重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维持联盟更广泛的合作必须包含一项积极的贸易和投资议程。拜登团队将需要消除特朗普政府与美国伙伴和盟友对抗所造成的损害。贸易和国际投资对美国 and 全球经济复苏至关重要。为了以多边方式重振国际经济合作，美国应该与其他国家通力合作，并将贸易和投资纳入其外交和气候政策议程。

通过通力合作，不同国家可以提出务实的倡议，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初步的努力可以聚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缓解经济衰退等紧迫挑战。参与合作的国家应足够多样化和具有代表性，但数量不宜过多，以便快速达成协议。

拜登还应该同意任命其他国家一致推选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候选人恩戈齐·奥孔乔·伊卫拉（Ngozi Okonjo-Iweala）。此举将恢复世贸组织最高层的方向，并激活世贸组织促进多边经济合作的能力。美国要恢复其在动员各国应对全球威胁方面的领导地位，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并停止将关税武器化的做法。

CSIS 威廉·莱因施谈拜登政府将如何处理贸易问题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1 月 19 日登载该智库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威廉·莱因施（William Reinsch）的文章《拜登政府将如何处理贸易问题》称，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会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他将更加寻求多边主义的解决方案。

文章称，对于拜登来说，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是“正确的诊断、错误的处方”。拜登团队会同意特朗普的很多批评，但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案。譬如，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出于国家安全担忧，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拜登政府会尝试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联盟和协商来应对中国，而不是通过单边关税。我们能预期拜登政府会花一到两年时间来致力于其联盟策略。如果该策略失败，国会将施压拜登政府考虑其他更激进的措施，而这会进一步加快两国“脱钩”进程。

在国内，拜登希望确保贸易能够使工人而不仅是公司受益，并利用贸易政策促进其环保目标。在贸易政策方面，拜登现在将注意力放在解决国内问题而非达成贸易协议上。但贸易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忽视贸易对拜登政府是不利的。

拜登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是否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他的顾问们目前对于是否加入 CPTPP 持不同意见。拜登会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保持更强大存在非常重要，并可能将加入 CPTPP 视为在亚太地区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拜登政府在上任之初需要做的另一个重大决定是，如何与欧洲打交道。任何应对中国的联盟都必然包括欧洲。跨大西洋关系在过去四年中经历了恶化，拜登政府现在试图修复跨大西洋关系。除了北约和俄罗斯，欧盟已经提出了重置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关系，但欧

盟的目标似乎是解决其担忧的问题，而不是协商一项综合的贸易协议。目前，美欧双方似乎对于这样一项协议都不感兴趣。此外，美欧之间不同的数字治理和隐私政策，以及欧盟的农业政策也加大了跨大西洋关系中的分歧。

目前尚不清楚拜登的“买美国货”运动会以何种形式展开。如果该行动最终有关联邦采购，其将激怒欧盟和加拿大，但不会在经济上产生太大影响，因为大多数联邦采购已经是国内采购。如果该行动最终演变成使制造业回归本土，它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无论首选的工具是胡萝卜——鼓励制造业回归，还是大棒——对不回归者进行惩罚，最终都会在税法中体现，这意味着立法，而这将需要国会的授权。

布鲁金斯杜大伟 称美国“亟需”重新思考在亚洲的经济政策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等的文章称，为了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力，拜登政府应该加强与该地区的经济接触。文章摘要如下：

近 4.2 万家美国公司向东盟十国出口产品，这为美国提供了约 60 万个就业岗位。随着中国更快地从疫情中复苏，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上升，并推进其战略目标，美国面临的政策挑战进一步增加。

为了修正这一问题，美国显然应该远离受管理的贸易，重新加入 CPTPP，并推动更多亚洲经济体加入该协议。CPTPP 中的标准解决了美国对中国的许多贸易“担忧”，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参与也将为未来与北京谈判创造筹码。

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政策下，特朗普政府扩大了基建努力。

它与日本、澳大利亚一道，建立了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三边伙伴关系，以促进基于高治理标准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它还与日本一同发起了“日本 - 美国 - 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JUMMP），美国初步承诺投入 2950 万美元。但这些倡议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具体项目。拜登政府应该切实利用这些平台，加速投资和贷款，特别是在湄公河地区。

通过进一步帮助东盟满足其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美国也可以在国内受益。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可以与加强新能源研发和提高能源效率的绿色议程联系起来，既造福该地区，又为美国人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传统基金会托丽·史密斯 谈华盛顿在 2021 年的三大贸易政策优先事项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网站 2 月 18 日登载该智库贸易经济学家托丽·史密斯（Tori Smith）的文章称，保持国际贸易和投资流动的开放是加快美国经济反弹的一项重要任务。经济强劲复苏需要坚定、持续的贸易领导力，美国应将以下三方面作为 2021 年贸易政策的优先事项：

第一，更新并完善“贸易促进授权”（TPA，又被称为“快车道”）。TPA 是国会授予总统谈判对等贸易协定的权利，现行的 TPA 将于今年 7 月 1 日到期。拜登政府很难在没有 TPA 的情况下，推进新的新贸易协定。因此，拜登政府应推动国会更新 TPA。现行 TPA 的到期也为国会提供了重估和改善 TPA 的机会。国会应该考虑控制有关劳工和环境的谈判目标，并修补部分漏洞，以避免行政部门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设定关税税率。

第二，通过鼓励改革，有效利用世贸组织。事实证明，世贸组

织是美国与其他成员促进公平互利贸易的有效工具。为了鼓励世贸组织更有效发挥作用，美国应考虑如何更充分地利用世贸组织的协定，并从战略角度更务实地改革世贸组织。譬如，在美国认为世贸组织缺乏效能的领域，华盛顿应与韩国、英国等自由贸易盟友合作，推动世贸组织进行改革。

第三，扩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网络。通过贸易投资与世界互动一直是美国繁荣的基础，也是世界增长的引擎。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应当努力消除多边、区域或双边贸易壁垒。目前，美国已与约 20 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 10 余项特惠贸易协定。美国应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贸易协定网络，鼓励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更自由地流动，并应对保护主义的挑战。

CSIS 建议美国建立新的全球贸易框架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肯定美国领导力贸易委员会”（CSIS Trade Commission on Affirming American Leadership）近日发布报告称，国际贸易体系和美国一贯扮演的领导角色正处于危机之中。如果不采取大胆行动加强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和谈判能力，该体系将继续恶化，并减缓全球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步伐。报告建议美国推动建立符合 21 世纪的贸易政策，包括：与志同道合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建立一项新的贸易协定；以务实的方式推动世贸组织（WTO）改革；推动美国贸易工具箱的现代化。报告摘要如下：

在志同道合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建立一项新的贸易协定

报告认为，世贸组织（WTO）的规则已经过时，充满了可利用的漏洞，而且对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应对往往过于缓慢。美国应召集志同道合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建立一项新的协定，就现代全球商业

所面临挑战的性质和范围，以及补救措施达成协议。由此产生的协议将建立 21 世纪的贸易规则、监测和争端解决机制。

在世贸组织之外建立一个新的贸易框架将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美国及其伙伴希望立即采取行动纠正全球贸易体系的方向。新的框架将允许成员国以一种协调、合作的方式重置他们应对全球化的举措。但是，新的框架并不会取代世贸组织，而是对其进行补充。

美国还应为该协定的成员资格制定标准，如对市场经济、法治、透明度和独立客观的司法制度的承诺，并推动一项能解决 21 世纪面临的问题的议程，包括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和劳动公平等。

激活并改善世贸组织

世贸组织将继续在制定全球贸易的基本规则、解决争端、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建立透明度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作为世贸组织的创始国之一，美国应在世贸组织展现领导力，并以务实的方式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以支持世贸组织改善上述功能。

美国应推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发布声明，重申世贸组织“开放、市场导向的政策和承诺”等核心原则。推动世贸组织鼓励及时通报的法规，并对不履行世贸组织透明义务的成员国施加惩罚。改进世贸组织的贸易政策审查程序，将更多利益攸关方纳入进来，并扩大审查的范围以囊括贸易治理，如地区贸易协议和气候变化政策的互动等。

通过改革修复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可能的改革举措包括：上诉机构的成员应该最多担任四个两年任期；如果上诉机构在解决三个争端过程中对某一条款做了同样的解读，该解读将自动提交给世贸组织成员国，并经协商一致采纳。鼓励世贸组织成员国签署一项联合声明，以支持这样的理念，即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能对专家组的决定提出上诉，成员国应在专家组作出初步裁定后，尽一切努

力解决争端，并应在《解决争端谅解书》规定的时限内解决争端。在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应建立一种以证据为导向、以标准为基础的方法，来处理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灵活性问题。

更新国内贸易法规

美国应审查并更新国内贸易工具箱，以确保有能力打击现有规则不能有效应对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在某些领域可能需要立法。如果美国的国内行动以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规范和原则为基础，并以此为衡量标准，就能向世界表明，美国愿意维护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即使美国目前的规则手册没有提供足够的空间来这样做。

美国可以采取的具体举措包括：更新 1974 年《贸易法》第 421 条，允许为应对从中国进口激增而采取针对中国的保障行动。更新 1930 年《关税法》第七章，以允许利益攸关方提交可能导致倾销或补贴的外国做法的证据，并规定在出现损害或可能出现损害的情况下，根据这些证据加速调查。扩大反规避调查的范围，以包括更多涉及在第三国发生重大转变的倾销或受补贴进口的情况。为 232 和 301 关税的豁免程序设立框架。在国内采取政策，积极应对贸易对市场 and 规则的干扰，并使所有工人为未来的经济做好准备。

【应对地区安全】

美国企业研究所肯尼斯·波拉克 称美应以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战略应对伊朗

美国法律事务（Lawfare）网站 1 月 10 日登载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肯尼斯·波拉克（Kenneth M.Pollack）的文章称，拜登政府应同时采取短期和长期互补的战略来使伊朗遵守对其核项目的限制，并为后续协议铺平道路。文章摘要如下：

首先，拜登政府需要通过谈判迅速恢复《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的原始条款，并暂时搁置达成后续协议的野心。美国的首要需求是让伊朗停止并终止违反 JCPOA 的核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正在破坏该协议和更广泛的地区安全。

其次，为了与伊朗达成后续协议，拜登政府必须制造更多针对德黑兰的杠杆。对于伊朗的强硬派来说，他们逐渐在中东占据的主导地位比繁荣的经济更宝贵。鉴于此，拜登政府唯一的现实选择是阻止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势力扩张，并击退德黑兰过去 12 年来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海湾地区的扩张。

最后，拜登在上任之初就应该公开重申美国对卡特主义和里根推论的承诺，保护其海湾盟友免受伊朗的地区攻势，并削弱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卡托研究所卡彭特称拜登应制定现实的对朝目标

美智库卡托研究所网站1月19日登载该智库安全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泰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的文章《拜登必须避免对朝鲜的战略耐心》称，在对朝政策方面，拜登应当摒弃一些不现实的目标，与朝鲜建立一种更正常的关系，这样才能有效缓解紧张局势。文章摘要如下：

在朝鲜问题上，拜登必须接受现实，即承认朝鲜可能永远不会满足华盛顿“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地”终结其核武器项目的要求。因此，拜登需要把重点放在更有限和可实现的目标上，以减少朝鲜半岛长期的紧张局势。拜登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提议与金正恩就相关议题展开实质性对话，如协商一项协议来取代1953年的停战协定，正式结束朝鲜战争。此举的象征意义对于开启美朝关系的新时代至关重要。其次，同朝鲜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包括互设大使馆，以促进更多对话。再次，为了取得有限的关系缓和，美国必须愿意大幅放松对平壤的经济制裁，并推动缓和对朝鲜的国际制裁。最后，拜登政府应提议结束与韩国部队的年度军演，以换取朝鲜从非军事区附近撤军，暂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

华盛顿还应与韩国就对朝谈判进行密切磋商，但不能让韩国政府否决美朝双边谈判的实质内容。拜登还需要放弃让朝鲜改善人权状况的要求，因为这与要求朝鲜完全无核化一样不可能实现。

在朝鲜问题上，拜登政府需要摒弃“孤注一掷”的做法，与朝鲜建立一种旨在促进和平共处的更正常的关系，这是缓解朝鲜半岛危险的紧张局势的最佳途径，或许也是唯一的途径。

布鲁金斯学会约书亚·怀特 谈如何加强美印防务和安全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研究员约书亚·怀特（Joshua T.White）的文章称，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在持续发展后正面临诸多挑战，拜登政府应作出调整来提升美印关系。

文章认为，美国可以做更多事情来阐明其在安全问题上与印度接触的关键优先事项：第一，支持印度成长为建设性的全球领导者，并制衡中国的影响；第二，限制中国“胁迫”印度和南亚其他国家的能力；第三，降低风险，使印巴和印中危机得以缓和。

文章提出了美印六大合作重点：将与印度的防务关系置于更广泛的双边与多边架构之中；推动更全面的防务规划对话，定期评估地区威胁环境，确定能力差距，并帮助印度军队获得这些能力；审查演习，优先安排高端活动，以便与有可能受到中国不当影响的第三国开展联合行动；持续支持高技术合作和共同发展；确认将情报共享进一步制度化的机会；深化协商，以降低在网络、空间和核领域出现的风险。

文章称，美印防务和安全关系是拜登政府更广泛的印太议程中一个相对低调但重要的部分，需要稳定的投资和重新调整，而不是大幅重新设计。

西华盛顿大学比蒂沙·比斯瓦谈美印安全合作的新前沿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西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比蒂沙·比斯瓦（Bidisha Biswas）等的文章称，美国应该制定更均衡的方式推动美印安全合作。文章摘译如下：

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信息技术和卫生安全等复杂、相互依存的挑战，需要新的合作方式来补充传统外交。美印可以推动地方政府、私营部门与大学建立伙伴关系，来推动满足两国安全需要的科技、环境和医疗创新。美印可以在五个方面展开合作：

一是绿色能源。在过渡至低排放能源方面，美印两国都面临着快速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性和大量国内瓶颈。地方层面的合作可以帮助实现该议程。深化对地方合作的支持能够激励合作，并为其他合作提供榜样。

二是卫生。印度有强大的疫苗生产和分发能力，但面临质量控制和知识产权瓶颈。两国在全球卫生项目中建立公共和私营伙伴关系，涵盖从研发到制造的全价值链，可能会非常强大。

三是气候。两国研究机构可以深化在地球观测和分析等方面的科学合作。目前美印的科学专业知识和活跃的合作使两国有望在国际项目建立标准和基础设施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四是创新与研究中心。拜登政府应当考虑推动两国进行更多尖端研究合作，以利用两国的智力资源，促进自主创新的解决方案。

五是印裔美国人。大量印裔移民是美国的一项重要资源。美国政府应该积极与印裔美国人领袖和组织接触，以促进上述合作关系。

联系方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电 话：86-21-53068153

传 真：86-21-53067106

电子邮件：siassias2015@163.com
